

目 录

古大存回忆录	(1)
一、踏上革命征途	(1)
二、大革命时期的五华	(2)
三、八乡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4)
四、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三〇年初的东江特委	(18)
五、红四军到东江	(20)
六、关于东江革命中心的争论	(21)
七、东江苏维埃和红十一军的成立	(21)
八、红十一军前期的斗争和立三路线的影响	(22)
九、东江行动委员会迁往大南山和闽、粤、赣边省委	(26)
十、红十一军后期的斗争	(27)
十一、王明路线的影响及革命低潮的到来	(27)
十二、在陆惠县委的工作	(30)
十三、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初的斗争	(31)
十四、在大埔地下活动的两年	(34)
十五、抗日战争时期	(35)

十六、参加党“七大”和延安整风	(39)
整理后记	(40)
古大存同志革命活动片断回忆	云广笑 (42)
在古大存同志身边的日子里	朱 荣 (45)
东江山青水更清	
——怀念古大存同志	杨 立 (50)
关于古大存同志的片断回忆	林务农 (61)
革命长者 风范长存	
——怀念古大存同志	侯 达 曾锡坤 (67)
缅怀石辟澜烈士	杨康华 (72)
夏衍、孙大光、钟敬文等同志	
回忆石辟澜烈士座谈记录	钟运蕃记录整理 (87)
回忆石辟澜同志	薛 汕 (91)
人民永远纪念他	
——回忆石辟澜烈士	连 贵 (101)
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工作时期的石辟澜同志	吴大琨 (104)
纪念石辟澜同志	段君毅 (109)
怀念石辟澜同志	胡子婴 (111)
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	
石辟澜同志	孙大光(叶兆南) (115)
在香港救国会期间的石辟澜同志	唐 章 (120)

怀念良友辟澜同志.....	方少逸 (126)
难忘的记忆, 珍贵的精神财富	
——记石辟澜在香港、延安等地	邓戈明 (129)
回忆石辟澜同志	吴华胥 (138)
回忆辟澜同志二三事.....	姜君辰 (141)
《新华南》与石辟澜同志	邓重行 (144)
怀念良师益友石辟澜.....	徐 青 (152)
记石辟澜同志和《新华南》杂志	李筱峰 (156)
怀念好同志石辟澜烈士.....	李育中 (168)
怀念我的好老师石辟澜烈士	梁 绮 (176)
怀念石辟澜同志.....	俞小曼 (179)
回忆石辟澜同志给我的帮助和教育.....	李静音 (182)
忆访石辟澜于《新华南》社.....	吕 器 (185)
石辟澜与《新华南》	魏中天 (189)
怀念石辟澜同志	杨 基 (197)
回忆石辟澜同志	唐晓声 (198)
党的好干部石辟澜同志.....	魏瑞珍 (204)
手足之情深似海 教诲之言永铭心	石尔安 (207)
石辟澜烈士牺牲前后调查记	张洪兴 (216)
怀念贺总.....	庄东晓 (228)

古大存回忆录

一、踏上革命征途

我原出生于地主家庭，是“后母”的儿子。十一岁时父亲逝世，“前婆子”假名分家，把我和母亲赶出家门，过着贫农的生活。我和他们斗争，争得了读书的机会。中学毕业后，我本想进高等师范读书，但家里要我读法政学校，以便将来为其做辩护士，否则便不供给费用。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一九一七年进了广东法政学校的。

因为我实在不想读法政，故读完预科一年之后便休学，隔了一年才不得不就读法政本科。一九一九年大概正是我休学的那年，所以现在对“五四”运动没有什么印象了。一九二一年陈独秀曾到广东法政学校演讲，讲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下面还有小标题《有几种社会主义？》《我们应选择何种社会主义？》这曾对我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在校时，我与同学沈春儒很要好，他对我也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我在广东法政学校第十二期毕业，（记得现在省文史馆的罗昌仁是与我同班毕业的）回家乡五华县中学教书。这时我开始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三年底或者一九二四年初我又来到广州，与我的同学沈春儒（又名沈厚培，一九二七年在南

路牺牲)、黄国梁经常联系。沈经常与杨匏安接融，是党内活动分子（任什么职务不明），黄是我党所办的国光书店经理。他们两人在一九二四年春天介绍了我入党，派我组织“五华青年同志会”，并到五华同乡会活动。我们以五华同乡会的名义出版了《春雷》杂志，宣传革命思想。

一九二五年二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杨匏安同志通过沈春儒找我谈话，派我去做东征军战地政治宣传员，随军去做群众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商民配合东征军战斗。战地政治宣传员是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委派的，当时的宣传部长汪精卫亲自给我写了委任的条子。我到了张民达师。当时到该师的政治宣传员共有四人，其他三人中，一个是姓方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一个是姓吴的，是共青团员（他经常与姓方的吵架），另一个是中间分子。

记得东征到惠阳县淡水时，我组织了一个商民协会，二、三天后，我们东进了，该会结果如何不知道。

我随军到了五华，不几天便到梅县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当时恩来同志注意到统战关系，听了我的汇报后便要我去“见见蒋校长”（周总理的记忆是惊人的。前几年他见到我时，还谈起当年在梅县会见时的情况），我见了蒋介石后便去找廖仲恺。廖先生确是个左派，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象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待人待事。

此后我便回广州。约在五、六月间，我进了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南堤设立的党校学习，大概学了一星期。记得张国焘曾来讲过课。

二、大革命时期的五华

约在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沈春儒同志又派我回五华，组

织群众武装，配合第二次东征。

回到五华后，我主要在梅林一带活动。八、九月间，梅林的农民自卫军在高石寨下与陈炯明的华振中旅打了一仗，我去参加了。但不是我指挥，参加战斗的有彭镜生、古邹鲁、古伯欧、甘敬可、古淑琴、刘式丹等，是谁指挥忘记了。

与此同时，在九区登云也有一支几十人的武装，由温伴樵同志负责。

第二次东征军到五华时，我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名义领导农民侦察敌情，协助作战。当时陈炯明在五华集结了二、三万人，妄图扑灭东征军。农民经过周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名义与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接头，通了情报，并研究决定，由农民侦察员带路，在鲤塘伏击敌人。这一仗，东征军取得了全胜，消灭了陈军二万多人。史实说明，当时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对于取得东征的胜利，是起了主要作用的。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我返广州汇报工作，当时黄国梁向我分析了五华的情况，说明搞好五华工作，对于整个粤东的影响是重要的，要我固定在五华工作，因此我马上又回到五华。

一九二五年底我回到五华时，宋青（当时是党员）已经在五华。他们已组织了县农会，会长魏宗元，副会长宋青、古大存，委员有缪钰如（老秀才）、古淑琴等。

魏宗元是个落魄知识分子，曾在海丰做小学教员，据说在海丰农讲所学习过，但从来没有加入过我党。他到五华做农会长时，脱离农民，与反动县长温鸣谦的关系很密切，利用农会长的名义推荐自己的兄弟去做官，他本人则在农会进行贪污，因此，我党的五华特支决定撤销其农会长职务。

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后，宋青主持开群众大会，宣布开除魏宗元出农会，改由宋青任农会长，我仍任副会长。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特支讨论时，我参加了。

有的同志把魏宗元当作五华农会的奠基人，应加考虑。当然他在农会初期是有一定贡献的，但过分夸大就不对了。

五华农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大革命时期，五华经常有许多农民到海陆丰挑食盐，他们受了海陆丰农民的影响，加之五华民性强悍，受压迫重，因此纷纷要求与地主展开斗争。党还没有派人去之前，梅林一带的农民便仿照海丰的办法自己组织农会。因此也可以说，五华最初的农会是农民到海陆丰挑盐头挑回来的。这是五华农会发展的一个特点。

当我在一九二五年底回到五华时，已有了我党的五华县特支，特支书记宋青，组织干事魏公杰，宣传干事古淑琴，军事干事古大存，此外还有干事梁家璧、古云章、魏弼汉。干事也就是特支委员。党员约有二十个，除河口、水寨还没有党员外，其他每区都有二、三个。记得起的有温伴樵、古清海、陈汉才、刘志炎、孔照苏、张任材、卢觉民。

当时我党组织是秘密的，许多决定都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去贯彻。我被派往五华工作后，即负责整顿国民党五华县党部。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周恩来同志从汕头派来的宋青、魏国谟、刘志英、古云章等同志。一九二七年一月召开国民党五华县党代表大会，选举我为常务委员（即党部书记），当时发展了许多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的成份多了，国民党就也被我党所控制了，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个特点。我们党通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控制国民党的党部，而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去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中共五华县委会。广东区委派吴健民来做县委书记，委员：宋青、古大存、卢觉民、张干球、古淑琴、古云章、刘式丹、梁家璧、陈汉才、廖候岳，共十一人。

一九二六年冬，吴健民调走后，宋青为代理书记。

一九二六年四月，正是春荒时节，五华的地主、商人还大量出口谷米，提高五华粮价，这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县农会写了报告给东江农会办事处，请准予禁止谷米出口。还未批准，地主已大量出口谷米了。河口农会便首先进行武装阻拦，扣留外运谷米的船只。接着，安流、水寨的农会也派了二、三百人去拦阻。斗争开展起来了，我便率领县农民自卫军三个中队（二百多人）到河口，宣布禁止谷米出口。反动县长胡淳从地主利益出发，向东江行署告我们状。同时，由于禁止谷米出口与梅县人矛盾（因为他们的粮食要靠五华供给），因此引起梅县的工会也向上告我们。这是在我们幼稚的情况下，没有估计到的。专员公署打电报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农会代替行政职权。国民党还派了涂思宗团到河口，企图镇压我们，我率领农民自卫军与该团隔河对峙。涂思宗团长亲来找我，我曾与他一同东征，彼此认识，我向他说明情由，因此他按兵不动，同情农民。

后来，我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的名义召开会议，县长胡淳也参加。我提出：禁止谷米出口事，应由县长解决，具体办法由农会提出。这意见没争论便通过了。县长一听到由他解决即拍手赞成，但他没有领会到“具体办法由农会提出”的话中另有文章，结果他只是做了农会办法的执行人。

当时扣留的船共有四百多艘，其中有些是龙川商人的，我们放过了，也解决了下游人民对我们的意见。凡是五华本县的便没收，一部分供涂思宗团为军粮，一部分供县府做经费。农会则得

大部分粮食，后来就用这些粮食平卖给农民度荒。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我来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后杨匏安同志另外召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开会，号召在农民中发展我党员，并且分析了甘乃光这个人装着左派的样子，实则心怀鬼胎，满肚子私字的人。

五华农民很熟悉海丰农会的活动情况，故一九二五年就开始进行拖租，等待减租。那时的农民，一加入农会，便俨然是共产党一样，很威风，所以敢向地主拖租。一九二六年夏，县委决定全县进行“二五”减租。梅林、安流、登云、华阳及其他山区（上三十二约）农会力量大的地方都普遍减了租。横陂因为有魏公杰阻挠，故没有减租。魏公杰当时是共产党员，但他家庭是大地主，减租要损害他的利益，他阳奉阴违抗拒减租政策。由此可见阶级烙印是很鲜明的。

到底减了多少租，很难算清楚。农民很聪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减租办法，首先是“年成减”，说收成不好，先减了四、五成，再进行“法律减”，即“二五”减。结果地主所得无几。

革命一深入开展，地主便起来反抗了。他们组织“资本团”以大地主李树眉为团长，进行武装收租。一九二六年夏出现“资本团”时，我向彭湃同志汇报，彭湃同志指出：资本团是全国还未听过的，可见五华地主之猖狂，要好好提防。

地主武装收租，农民只好武装抗租。武装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五华的农民武装。

五华农民，民性强悍，对陈炯明的压榨恨之入骨。在第一次东征时，就有零星的武装农民自动配合东征军作战，作交通、运输等。农会成立后，便组织起农民自卫军。县为大队，区为中

队，乡为小队。所有农会会员都是自卫军的成员。起初没有常备武装，抗租时集合，平时则各自在家劳动。

陈炯明有一旅长叫张伯洲，是五华大田人。陈逆失败后，张伯洲领有五、六百残兵潜在大田，这些兵多是大田张姓人，可谓大田地主的家族兵。这时挂陈炯明的招牌是无法立足的了，故改名叫××大队。由流氓张九华指挥，由“资本团”供给军饷，暗地里受孙文主义学会（当时在五华是秘密的）头子张谷山支配。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张九华领匪军五、六百人突然袭击双头（靠近岐岭）、潭下，直窜至华城，在华城附近抓了几百农民，并到处烧杀。

当张九华袭击双头后，县农会便讨论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的常备队，在各乡精选四、五百人组成县农民自卫军常备大队，以曾伯钦、陈笑眉为正、副大队长。下分三个中队，以古松柏、甘斗、彭镜生、古前、陈子文分任正、副中队长。各区亦设立常备中队。全县常备武装的二千多人。

为训练农民自卫军的骨干，十一月间，又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的模范队，初有五、六十人，李斌为队长，贺民教、邓亿为教官。

广东区委和汕头地委对五华的武装是很重视的，从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初先后派了黄埔军校毕业的古官权、古定欧、魏衍民、李斌、贺民教、邓亿等同志来五华担任农军的领导或教官。派来领导C.Y县委的曾勤（曾天节）、古日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县农民自卫军的武器来自几方面：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东征军涂思宗团把缴获的枪支送给县农会一百多支；县农会本身购置和收缴地主的一百多支枪。我去没收缪培南（军长）家藏的枪一百多支。这样就有了三百多支枪。此外，农会还设立了小兵工

厂，修理枪械和制造土枪，翻造子弹。兵工厂有二十多个工人，由古松伯兼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当张九华匪军四出猖狂烧杀的时候，我率领农民自卫军七、八百人进行反击。打了两、三仗，把匪兵从华城附近赶回双头，并把他们围困在双头的道安楼（一个地主的大屋），我便领常备队三、四百人驻在道安楼对面的石结围。因敌人固守堡垒，我则缺乏武器难于攻坚，故我们的战略是把匪兵困死在道安楼。他们连食水都不敢在白天出门挑，只好夜间出来。我们便在夜间打他们。匪兵被我围困得没办法，便在春节期间半夜逃跑。我们追击时，俘虏了二、三十个匪兵。当时农民恨他们，一抓来便把他们打死了，而我们领导人当时缺乏政策头脑，没有严格制止，这是一个教训。

张九华匪兵逃至潭下驻防，使潭下农民受害很重，百安农会也受到威胁。我便领常备队转驻百安，与其对峙，直至“四·一五”事变。

在百安对峙时，我发现反动县长胡諄写报告给李济深，称我们的斗争为“新农会与旧农会争斗”。原来地主们欺骗群众，说他们是国民党的“新农会”。

当年激烈的武装斗争情况说明：在我党领导的大革命开展之后，孙文主义学会出主意，旧军阀出残兵，地主的资本团出钱，指使流氓挂起“新农会”的招牌来进行武装反革命。农民，只有搞起武装来才能保卫和推动革命。实际情况是反革命首先进行武装镇压，农民不得不进行反击。但是五华有些农民盲目的自尊心很强，他们回忆当年历史时，不愿说农会受到地主打击，只愿说农会打大田，以表示农会的威风。这是不对的。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我党的县委进行分析：“新农会”是

孙文主义学会头子张谷山出的主意。我们该如何继续斗争？当时的情况是：（1）我们无钱，又不能征税，只靠各乡送粮；（2）战斗时间长了，影响生产，农民思家，使部队涣散；（3）宋青认为县农会全力集中于打仗，影响其他工作开展；（4）反动县长诬告我们，而东江行署却批评我们过火。县委研究结果，想用和平的办法，使张九华缴械。由我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通过县长把张谷山“请”出来。

张谷山是张家的族长，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又是封建三点会的头子。曾充当胡汉民的秘书，增城县长，又是满清时的老廪生。他为人阴险狡猾，没有出面与我们斗争，而是资本团、地主兵的幕后指挥人，一切坏主意都是他出的。

我去找县长胡淳谈话，说明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道理在我这边。并表示愿将农军撤出，由县长办理善后事，但有两个条件：（1）县长必须遵照孙总理遗嘱，把军阀残余部队缴枪解散；（2）由县长向资本团募集八万元救济被害农民。胡淳听到募集八万元，感到可乘机捞一把，很高兴表示同意，但又感到这条件难于行通，因为他无法请张谷山出来。

接着，我带了两名自卫军，直入张谷山家里（在华城附近的湖田村）、说县农会长拜见张老师（当时人这样称他）。张出乎意外，神色不安。我“恭维”了他一下，说请他出来“和事”。我了解解决办法后，他提出：资本团出六万，商民协会（是我党领导的）出二万。我便说：“请张老师到华城与县长共谋”。他带了四个随从与我一同到华城。但他要住在张家“文成当”（当铺）。我说：“我年青可多走走，我去请胡县长来”。我即回农会叫李斌领了模范队一小队潜进张家当铺，准备扣留张谷山。我进张家当铺时，张谷山已叫了商民协会代表在“商量”。张说，“救济应有两方面，大田

张姓也死了不少人，亦应救济”。我说：“大田死者亦可抚恤，但应由农会统一安排”。这时李斌在周围已布置好了，我便说：“请张谷山老师到农会协助办理”。他突然变色，说“你们不诚意”便要走。我一喊“李教官”，李斌（五华县志和古大存同志解放初期的回忆都说是贺民明。——编者）便领农军冲出来，把张谷山带到农军指挥部（设在百安）。

这时封建姓界思想作怪。安流区的党员张彩政，张干球，张访基一听到张谷山被扣押，便叛变。他们带二、三十名武装坐着船向县农会（在横陂）进攻。我闻讯即派农军一小队去截击。叛徒被全俘。当时农民愤恨情绪难抑，叛徒被押到指挥部门口时，便全被打死了。

我们对张谷山还是以礼相待的，但张却向我们作绝食斗争，无论如何也不答应缴枪。事实说明，你要革命，地主便无论如何也不肯放下武器的。

“四·一五”前后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接到广东区委和东江特委的指示：加紧扩大武装，培养自己的武装骨干。这说明当时广东区委可能发现了陈独秀右倾路线的危险而着重抓武装了。

看来广东区委对反革命事变也是有所准备的。四月上旬，区委派交通送信给我，告诉我驻五华的宋世科团某营营长古怀是共产党员，其下属三个连长也是我党员，并要我与古怀取得密切联系，（记录人按：梁复然说：一九二七年四月，延年叫他送信给古大存和在汕头的张善铭，并口头交代说：叫古大存保存自己实力，不要与国民党兵冲突。）但古怀是不可靠的分子，国民党一叛变，他便只身逃到我部队来。“四·一五”后几天，区委派黄国

梁同志到五华找古怀，可能是命令他起义，但古怀已逃走了，黄国梁一到宋世科团便被杀害。

我们按上级党的指示，在二、三月间便扩大了模范队。至四月上旬，张九华已被我们打怕了，局面安定些了。因此我离百安到横陂，于四月十五日在横陂召开县农民代表大会。大会的目的是想搞废租，以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同时安排生产，做到打仗、生产两不误。农代会正在进行时，反革命的宋世科团即来包围。我领农军一个小队坚守着一个当铺，与敌激战数小时，其他代表便安全疏散了。当天，锡坑、鲤江、安流等地的几万农民鸣锣击鼓从四面八方赶来，反把敌军包围了。敌人只好撤退。我解围了。

当我被包围的第二天，宋青领驻百安的农军撤回横陂。在撤退途中，把张谷山杀了。

经过几次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农军六百多人隐藏在梅林、安流、龙村一带的农村，进行休整，扩大党团组织。转水角（地名）的同志们为培养党的后备力量，还组织了救党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

同年五月间，宋世科匪部撤离五华，我们按上级指示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为主席。但当时我们不明确革委就是政权组织，而农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故许多事情还是由农会出名处理。农军则改为工农讨逆军五华县大队，古定欧为大队长。

五月间我去海丰联系工作，途中到公平时，恰海丰工农讨逆军一千多人要北上武汉，以吴振民为总队长，杨石魂为党代表。（刘琴西也有见到，当时他是陆丰县长）。我碰到吴振民时，建议他不要离开东江，以保持实力，首先把东江的革命搞起来。但他们坚持要北上，因此一同去见当时在东江的党的领导人张善

铭，张善铭感到同志们热情很高，也同意北上。当下石魂便要我随北上工农讨逆军到五华，成立“人民政府”以配合，并要我筹出二万元作为北上费用。石魂还说：“我是党代表，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随军回到五华后，认为要筹款便只好打安流。我们打下安流即宣布成立“五华县人民政府”。以人民政府的名义筹了一万多元给吴振民北上。这支队伍“七·一五”后在湖南被敌人消灭了。

当时的“人民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建立的，只是把革命委员会改个名字，在当时宣布一下吧了。

“七·一五”之后，按上级指示，取消农会，健全了“五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我仍为主席。五华工农讨逆军则改称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七团队，我为团队长。全团有二千多人，（包括区联队）当时可以集中的有成万人，但枪支只有六百多。当时农会在农民心目中是命根子，而革命委员会却是农民还不理解的名称，因此农民都反对取消农会，但我们又只好按上级指示办事。

“八一”起义军到东江时，我领兵到猴子栋去迎接起义部队。但到虾蟆落井（地名）时，受附近山上的陈济棠兵阻击，后来我们始终没有与起义部队取得联系。

十一月间，省委派林定（挺）为五华县委书记。当时县委提出“焚烧契约、废除债务，没收土地，平均分配”。不久林定离开，宋青做县委代书记。

十二月间，“资本团”在对镜窝（地主村）组织所谓“讨赤团”与我们对抗。我领部队攻入对镜窝活捉了“资本团”长李树眉。县委决定镇压他，革命委员会出了布告，宋青却突然受地主收买而动摇。地主们说用三箩光洋（约计数，当地每箩可装谷五斗）来

赎李树眉，这显然是地主的诡计。但宋青却提出释放李树眉。罪大恶极的资本团长是革命的祸根，不杀则难平民愤，我不顾宋青的反对，坚持执行县委的决定。镇压资本团是五华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

广州起义后，闻起义军撤向紫金，我领兵一千多，到紫金龙窝迎接起义军。到龙窝时，起义军已离开，张发奎的缪培南（军长）部正在追起义军，我部在此与其遭遇，激战一场，使匪兵不敢继续前进，我们撤退经炮仔墟回五华。炮仔墟与五华关系密切，过去常有五华的小部队在此活动，他们可能与紫金刘琴西同志的部队有联系，但这次我没有与刘会合。

约在一九二七年底，我们举古公鲁同志为行动总指挥。公鲁当时不是党员，他曾参加过同盟会领导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又做过五华县代理县长。我们为了争取他不至被敌人拉过去，便给他挂总指挥的名，实际指挥的是我。敌人果然通缉公鲁，他只好跟着我们走，后来变成个好同志，在八乡山时（约在一九二八年）便吸收他入党，一九三〇年他在任红十一军的军需处长时牺牲。

一九二八年一月，张发奎的黄旭初师进五华疯狂烧杀。这时我部队撤退至琴江庵子塘（宋青的家乡），县委决定由我出去扩充武装。我离部队后，宋青却宣布解散部队。这个叛徒逃走了，武器被埋藏下落不明，战士空手回家。我回到琴江时，李斌见到我便说：“完蛋了，部队被解散了！”我也非常愤怒，但李同志是外地人，我便安慰他说：“有我则有你，不要愁”。

“四·一五”以来，环境虽然艰苦，但我们的武装一直没有多大损失，而宋青的叛变却使我们遭到严重打击，部队被解散了，只剩下古大存、李斌、古宜权、古清海、贺民教、古定欧、古公

鲁、古日晖、古怀、甘朋、甘富、彭镜夫等二十多个同志，分散走上八乡山。

这时还有分散在各区的同志，如陈笑眉、廖候岳、万化龙、周汉平等。

三、八乡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八乡山是横跨五（华）、丰（顺）、揭（阳）的大山。这里的农民深受压迫剥削，容易发动。高山险路和劳苦的群众都利于掩护我们，在地理位置上又易与各县同志取得联系，在白色恐怖弥漫，革命遭到严重摧残的时候，我们要寻找对付反动派的办法。故我们决定到八乡山去坚持斗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我领了五、六名武装从琴江经安流、鹤园、竹园子、鲤塘径，第二天到了黄竹坪。我们在此建立了据点，后来发展到小溪、马屋山。其他十多个同志也陆续到了八乡山。

二月间，林定也来到八乡山，他说要与丰顺的同志徐勉风联系，要我把驳壳枪借给他，他把我的枪骗去后，便与徐勉风一同逃至南洋。

革命低潮的形势下，动摇分子都逃跑了，留在八乡山的是十八、九个坚定精干的同志。同志们公推我为书记，但没有选出县委委员，经常商量的有李斌、古宜权、廖候嶽、古清海、陈耀等同志。

这是艰苦的岁月。敌人依仗其人多枪多，天天搜捕，杀害我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我们以八乡山的黄竹坪、小溪、马屋山为据点，分散在四处活动并重新组织革命队伍。起初我与几个同志到丰顺的栋下为富农做工，每人除吃饭外每天得五分钱工资，合